

展现中华文明脉络的西北大学考古人

本报记者 吕扬 郭青 通讯员 李世宽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使亚欧文明交流互鉴留下了一处处历史的见证。两千多年后,人们在追逐历史痕迹的步伐中,不断还原昔日场景并赋予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西北大学考古人在与丝绸之路结缘中不断前行。

8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西北大学考古人围绕丝绸之路研究开展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全国科技考古人员超过40%出自西北大学,全国文物保护科班出身人员超过50%出自西北大学,全国各地考古队长超过60%出自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已经培养了6000余名毕业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培养体系最为完备、社会认可度最高的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这些毕业生71%服务西部,80%扎根基层。

促进与丝路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

黄文弼是西北大学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在中国丝绸之路考古、边疆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5月15日,由西北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师范大学主办,多家单位协办的“丝路丹心——黄文弼与丝绸之路”特展在西北大学博物馆正式开展。特展全方位回顾“西北考古第一人”、丝绸之路考古开拓者黄文弼的生平事迹,纪念他在考古学和教育学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1943年,时任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黄文弼受学校委托,经重庆、西安、酒泉至敦煌,沿河西走廊前往新疆进行考察,历时8个月,首次涉足北疆地区。黄文弼是最先进入新疆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中国学者,曾4次深入新疆开展科学考察,前后历时近6年,行程3.8万余公里。黄文弼考察范围包括内蒙古与甘肃西部,新疆北起阿勒泰、南至和田、东起罗布泊、西至喀什。他调查遗址大小数百处,重点发掘数十处,特别是在吐鲁番盆地、罗布泊、塔里木盆地获得丰富的考古成果。

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使亚欧文明交流互鉴留下了一处处历史的见证。两千多年后,人们在追逐历史痕迹的步伐中,不断还原昔日场景并赋予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

80多年前,西北大学考古人对城固县张骞墓进行过发掘和修缮。从此以后,西北大学考古人和丝绸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围绕丝绸之路考古开展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2019年6月,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开展中亚考古十周年。这支由8名西大文化遗产学院骨干教师、12名学生组成并吸收国内外19家合作单位59名成员先后参与的考古队,用不畏艰辛的稳健脚步丈量着丝绸之路,用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寻找着历史印记,用尊重包容的可贵品格架起了丝路文明对话的桥梁。

1999年提出“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2009年走出国门,进入中亚,这支考古队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取得了一系列首创性的重大考古发现。

“20多年来,考古队坚守高校教师知识报国的初心和使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与丝路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员、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马健说。

考古一线的西大传人

引人瞩目的西安江村大墓考古主持人是西北大学毕业生马永顺,石破天惊的神木石峁遗址考古主持人是西北大学毕业生孙周勇……在陕西乃至全国,参与重大考古发现的考古团队中,处处闪现着西大考古学子的身影。在文物保护领域,付巧妹、周萍、雷勇、成小林等一大批领衔人物均出自西北大学。

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隋唐洛阳城遗址等100项考古发现入选。细心的人们注意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由西北大学师生及校友主持的考古发现达到25项,占四分之一。

无独有偶。国家文物局每年委托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评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的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年水渭一号墓项目、河南伊川徐阳墓地项目、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项目、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项目主持人都是西北大学校友。近5年的50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18项由西北大学校友主持。

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邵晶就是亲历者。

虽然上大学时考古专业是冷门中的冷门,但邵晶还是选择了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并于2009年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2012年初,刚结束寨头河墓地考古工作的邵晶接到新任务,带领考古队直接从黄陵出发,奔赴神木高家堡镇石峁村秃河北侧的石峁遗址。“在这里的3000多天,我们感受着陕北夏天的烈日和冬天的寒风,在住土窑和没水、没电、没信号的环境中,日复一日与土为伴。”邵晶说,但条件越是艰苦的地方,遗迹才能保存得越好。邵晶参与和负责的神木石峁遗址考古项目先后荣获国内外多个重要考古奖项,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他也从一个青涩的考古“新手”成长为陕西考古界的知名学者。

“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而非凤凰嘴。”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一考古成果,解开了汉文帝霸陵位置的千古之谜。这背后是汉陵考古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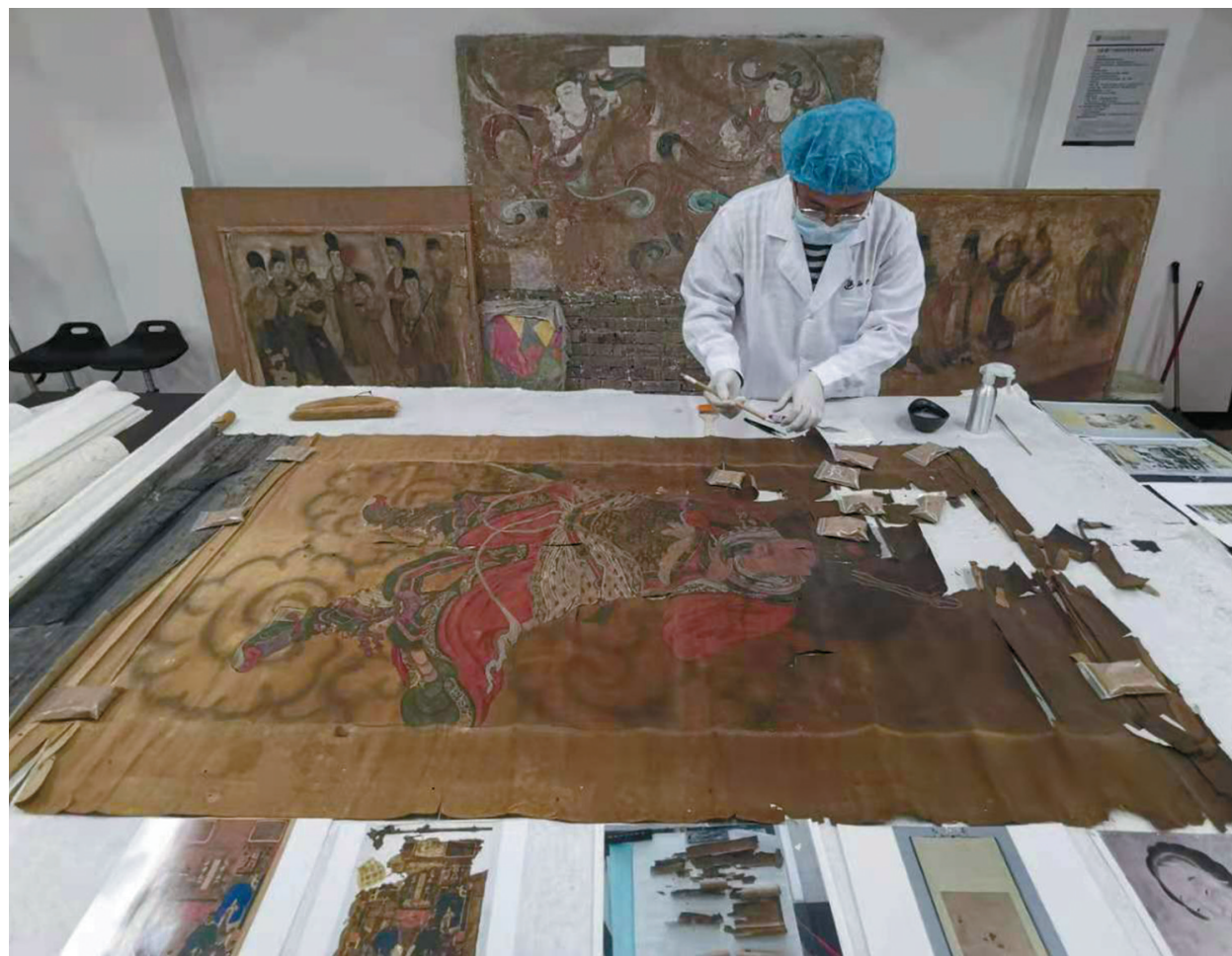
2001年,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盗掘出黑陶俑。当时,正在开展咸阳县上西乡帝陵考古工作的焦南峰等人,马上把工作重心转向霸陵。2006年,考古队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及其周边外藏坑、石围界等。由此,距江村大墓800米的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并开启了对汉文帝霸陵具体位置的讨论。焦南峰是西大考古专业毕业生中的名人,曾任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这位68岁的考古学家,研究秦汉陵墓40年,白发早已爬上双鬓,但他仍快乐得像孩子。焦南峰说:“考古工作能带给我成就感。我们把西汉11座帝陵都探了一遍,其中9座都有新发现。”

2017年,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勘探发掘。随着钻探的深入,一个规模很大、顶级配置的墓葬出现了。墓葬形制是“亚”字形,墓室边长约73米,四周有110多座外藏坑。

“在汉代,这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或皇后才能使用。”焦南峰解释,大家觉得江村大墓可能是霸陵,但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翔实的证据。焦南峰和考古队成员通过严谨细致的勘探发掘,发现了大量关键性证据,最终确定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至此,西汉11位皇帝的帝陵名位全部得以确认。

依托众多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西北大学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建史前文明研究、商周文明研究、秦汉文明研究、隋唐文明研究等学术团队,聚焦黄河中上游史前至隋唐时期高等级聚落、城址、墓葬及宗教礼制建筑等,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了多元一体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科学技术、天文礼制及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与对外交流情况,明晰了中华文明“血缘认同—地缘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历史进程,为增强国家凝聚力、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西北大学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联合考古队,通过对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的发掘,证实了晋陕高原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该项目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文物修复实验室。

本报记者 吕扬摄

培养考古专业人才的高地

1938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前身)为保存教育薪火南迁汉中城固。历史系下设的考古委员会本着实证中国历史、振奋民族精神的使命感,积极组织师生调查研究汉中地区文物古迹,并对张骞墓进行正式考古挖掘和修缮。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由此发源。此后,西北大学考古人在“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理念引导下,取得了一项项考古成果,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已经进入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A+”等次,在“更高、更远、更新”的视野和舞台上,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道路上踔厉奋发、砥砺前行。

今年初,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布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高校名单,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全国13所高校入选。各培养高校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创新协同育人模式,为我国考古事业培养和储备一批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才,为实现我国考古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已经培养了6000余名毕业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培养体系最为完备、社会认可度最高的考古学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这些毕业生71%服务西部、80%扎根基层。全国科技考古人员超过40%出自西北大学,全国文物保护科班出身人员超过50%出自西北大学,全国各地考古队长超过60%出自西北大学。王子今、王震中、袁靖等知名学者独树一帜,付巧妹、庄奕杰、刘睿良等青年才俊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刘莉、李峰、黄晓芬等在世界知名高校传道授业,张廷皓、宋新潮等在行业主管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豆海峰说:“西北大学把学科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相融合,为我国考古事业培养具有扎实专业技能、卓越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考古学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实践教学起着关键作用。西北大学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开展教学科研,为学生提供高水平实践机会和平台。甘肃临潭磨沟遗址、新疆石人子沟遗址、青海都兰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河南南阳羊辛遗址、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萨扎干遗址等,都留下了师生们实地开展科研的身影。

展现科技考古的高校力量

青花瓷是如何诞生的?有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西北大学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温睿教授团队用同步辐射光源的X射线荧光对青花颜料的成分进行检测,发现其重要原料钴料成分与波斯地区的蓝彩陶瓷成分具有相同特征。“波斯文献中对蓝彩的来源、加工有着详细的记录,元青花与其相同,证明元青花的原料来自波斯地区。”温睿介绍,对蓝彩的成分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青花瓷衍生出了跨区域的产业分工、贸易链以及文化融合。“如果没有科技考古,没有这样的成分分析,我们很难了解工业文明之前的全球化进程。”温睿说,科技考古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发掘出古代遗迹中的潜在信息,提供解释理解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新视角。

2018年,陕西省考古人员在西咸新区咸阳市城址的岩村墓地发掘中,发现了存有液体的铜壶,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样本送到西北大学科技考古中心进行鉴定。经过成分分析,西北大学科技考古中心人员发现出土铜壶中液体含量比较高的是氨基酸类物质,还有少量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确认这些液体是酒类物质,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陈酿”。

今年6月,西北大学承担的“天山地区古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项目顺利通过综合绩效评估,专家组的评价是“以高水平成果达到预期目标”。该项目从2017年开始实施,项目团队通过对古DNA进行分析,系统揭示出乌兹别克斯坦人群自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遗传结构与遗传连续性,为进一步了解天山东西部以及欧亚大陆西部人群的迁徙与融合历史提供了重要遗传学证据;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东天山40多处遗址的人骨样本展开研究,填补了相关时间和区域的人类古基因组空白。

前沿科技还能够对文物保护方面大显身手。西北大学积极与文博行业机构深入合作,开展联合攻关,聚焦文物材质分析方法与新型保护材料研发,关注文物病害的形成机理,研发文物保护修复与预防性控制技术。相关研究团队探明了土遗址盐害、壁画裂隙等病害的发育成因,创新了有机残留物及无机物微量元素的分析方法,研发出石质文物清洗、纸质文物疏水保护、古建筑材料加固保护等新型技术,以及湿固化聚氨酯、明胶微球等文物保护新型材料,解决了特殊环境特定文物保护加固的难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了技术支撑。

(资料照片)一九三八年发掘调查张骞墓

陶甗 芦山峁一号院落房址内出土的

汉文帝霸陵出土的部分印章。

本报记者 郭青摄